

## 天險悠悠：六朝辭賦中的江海書寫與國家想像\*

祁立峰\*\*

### 摘要

六朝倚長江天險立國，因此江南王國不同於建都於北方的帝國，反而與水勢有著密切關係。基於此，本文透過六朝以江海辭賦為核心，兼及其他文體進行探討，發掘六朝作者如何將江海意象與國家想像連結。全文主要分為兩個層次展開論述：首先，探討六朝以江與海為題材的辭賦，爬梳六朝的江海書寫如何表現當時作者的國家想像與認同；其次，探討六朝賦家如何將江海與都城結合，並談到南方王朝覆滅之際，江海水勢又於不同文體中呈現怎樣的意象。透過本文的探討，希望能釐清文學史中江海此象徵遞變的關鍵所在，也探討這個傍水而建立的六朝，當時作者如何想像與定義他們身處的世界。

關鍵詞：六朝、江賦、海賦、國家權力

---

\* 本文為筆者 104 年度科技部專題計畫「成為江南人：南朝作家對南方的想像與認同」(計畫編號：104-2410-H-005-047-) 之部份成果，感謝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特此誌謝。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江海作為一種題材

一國興來一國亡，六朝興廢太匆忙。南人愛說長江水，此水從來不得長。<sup>1</sup>

### （一）具政治意義的江海書寫

六朝倚長江天險建國，向來有南船北馬、南水北陸之說，「水」與「陸」也成為界分南北的要素之一。而在人文地理學的研究中，這種文化地景象徵的不只是地理學意義的空間，更隱含複雜的文化意涵，而水勢也就不僅是屬於南方的文化屬性，也多少隱含政治與國家意義的象徵。

而當作家透過文學作品再現江海等水勢意象側寫江南時，也就顯出這種多重的文化意涵，如人文地理學者 Cosgrove 就認為地景是一種文化意象與象徵，也就是說「地景」除了代表實存的地理學空間之外，更已經過創作者的再現與架構。<sup>2</sup> 就前行研究來看，關於六朝作家如何透過江南元素來建構或再製江南，田曉菲針對〈采蓮曲〉所進行的相關論述頗為深入。<sup>3</sup> 而高莉芬、吳翊良也曾討論到「江海賦」題材背後的國家和政治寓言。<sup>4</sup> 不過高氏偏重水的神話象徵；吳氏則偏重於山水的整體概念。相對來說，本文從權力與國家政治切入，聚

<sup>1</sup> 〔清〕鄭板橋，《鄭板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頁71。

<sup>2</sup> Denis Cosgrove, *Geography and Vision: Seeing, Imagining and Representing the Worl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12.

<sup>3</sup>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其中〈『南』、『北』觀念的文化建構〉這一章節，討論到「採蓮：建構江南」的這一部份，頁260-269。

<sup>4</sup> 高莉芬，〈水的聖域：兩晉江海賦的原型與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1期（2004年6月），頁113-148，以及吳翊良，《空間·神話·行旅——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97-120。

焦探討六朝的江海意象如何被敘述成為帝國穩固的要素，成為南方士族的共同體經驗，其後當國破城滅之時，江水又多了一層感傷象徵。

本文最末一節將提到——唐代出現了不少懷古或詠史題材的詩歌，充滿了對六朝覆滅的感傷，或對長江無情的詠嘆。<sup>5</sup> 相對來說，六朝文本中的山川險阻——尤其是「長江」這樣的天險，則經常與軍事和國家有關。此處可舉幾則《水經注》的記載來說明：

（又東過夷陵縣南）孫皓鳳凰元年，鷲息闡復為西陵督，據此城降晉，晉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為陸抗所陷也。……所謂陸抗城也，城即山為墉，四面天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sup>6</sup>

（湘水從南來注之）吳黃蓋敗魏武于烏林，即是處也。……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龍穴之名焉。<sup>7</sup>

（鄂縣北）《武昌記》曰：……孫權常獵于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權常極飲其上，曰：墮臺。醉乃已。……城西有郊壇，權告天

<sup>5</sup> 誠如田曉菲談到蕭綱（503-551）等人的〈採蓮曲〉時所說的：「對後人來說，江南之『空』因為種種歷史事件的發生，而不僅僅是一個比喻性的說法，因為我們知道南朝終於覆滅，江南被蹂躪踐踏。如果對於蕭綱和他的同時代人來說，江南是一個近在眼前的世界，江南予人的快樂是真實可感的，然而，他們塑造出來的江南形象到了後世，卻因為我們的歷史知識而帶上了一層哀婉感傷的色彩」，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頁267。對六朝作家來說，江海水勢的洶湧象徵的也是都城的穩固與國勢的強盛，而到了六朝覆滅之後，水勢也因為這種歷史知識，而成了感傷或見證天道的無情存在客體。

<sup>6</sup>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96。

<sup>7</sup> 同前註，頁604-605。

即位于此。<sup>8</sup>

第一則文本即便說山郭城墉，但正因陸抗城四面水勢，造就壁立險峻的地勢，而二三則文本都講江水與國家、戰役的關聯。一方面長江處處關隘，戰事不絕；二方面江水透過戰役，與國家的興衰聯繫在一起。以此三則來說：陸抗（226-274）死守步闡故城而對抗羊祜（221-278）；劉義隆（407-453）於當年赤壁戰舊地遇黑龍負舟之異象；或孫權（182-252）即位的國家大歷史，並非每一則大歷史事件都發生於長江畔，但酈道元（？-527）將這些空間與長江連綴在一起，而這每一則與南方王朝息息相關的軍事聲威、建國史實或神話，就成了長江流域的重要地景，而與江水緊密結合。

過去研究者認為六朝山水詩興起，代表某種新感性。<sup>9</sup> 當然，個別詩人往返揚荊，眼見江水奔流，感受到私我的小歷史（history）欣然或愁緒；然而對國家的大歷史（History）來說，江水所流經的每一座城市，人為或自然所形成的每個據點、關隘，都有其關鍵的歷史與軍事意義。而正因為長江天險的易守難攻，於是乎每一場據江水對峙的戰爭，以及戰爭其後的發展和影響，就如同江水一般處於流動狀態，構成了江南帝國的大歷史。從這個角度來看，六朝的國勢或政局確實與江海水勢關係密切。不過，江海是何時且如何成為一種文學題材呢？

<sup>8</sup> 同前註，頁 607-608。

<sup>9</sup> 「新感性」這個說法筆者引用王文進，〈南朝文學的歷史想像與山水關懷——論邊塞詩的「大漢圖騰」與山水詩的「欣於所遇」〉，《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頁 239-262。王認為在真切閃耀的山水面前，文人得以抽離歷史時空的羈絆，掌握眼前可見的美景。而就筆者的看法，相對於辭賦的集體國家意志，詩歌中較能展現作家私我的經驗，像「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流」（鮑照〔414-466〕〈還都道中〉）或「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謝朓〔464-499〕〈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贈西府同僚〉）的敘述，江水的洶湧屬於小歷史的經驗，與作者個人的思鄉情緒與兼程趕路的急迫感有關。「欣於所遇」出自王羲之（303-361），〈蘭亭集序〉，詳細論述請參酌王文進該文，頁 242-243。

## （二）江海書寫的傳統

自有文學藝術以來，巍峨的峰巒或騰湧的江海，它們所帶給人們的壯闊與崇高，往往造成創作者強烈的震撼與感受——像杜臺卿（?-579）〈淮賦〉所說的「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吟詠比賦，可得而言矣。」<sup>10</sup> 至於江海題材的起源可追溯至《詩經》的「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等描述。在六朝文論中進一步注意到山水等外在物色世界對於作者的刺激與反應，《文心雕龍》中有幾段與山水有關的論述：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sup>11</sup>

及長卿之徒，詭勢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sup>12</sup>

〈物色〉一篇談的是創作者與外在世界的接受與反饋，作家模山範水，於是有了鋪張形似的作品；〈明詩〉此段一般將之視為討論六朝詩歌題材的轉變，在題材變換同時，山水景色的富麗又造就了詩歌的繁複，這同樣是創作者受到山水刺激而反饋的例子。事實上，山水景色除了影響到文學作品的辭藻、意象與對偶外，同時還隱含深刻的文化意涵、以至於家國想像，是故筆者從江海書寫切入。

過去學者從佛教、玄學或從現象學等角度，討論山水詩的起源與

<sup>10</sup>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4133-2。

<sup>11</sup> 〔南朝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校注，〈明詩〉，《文心雕龍校注》（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35。

<sup>12</sup> 同前註，〈物色〉，頁294-295。

意義，已有了豐碩成果。<sup>13</sup> 然而筆者認為詩歌與辭賦理當放進不同脈絡討論。在相關文獻中得以發現——六朝士族一方面縱情山水；另一方面又對山川景色存懷感傷，如袁山松（？-401）「欣然」對山水、<sup>14</sup> 王子敬（344-386）「應接不暇」、<sup>15</sup> 相對於「蘭亭集」、「新亭對泣」的記載。詩人受到南方山水的刺激進而創作，而他們的詩歌也就呼應山水的繽紛富麗。

但辭賦中的江海書寫何以不能置入此脈絡？本文以為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辭賦的自身文類特質；其二是辭賦與國家權力的密切關聯。首先，辭賦有「宣上德而盡忠孝」、<sup>16</sup> 「體國經野，義尚光大」<sup>17</sup> 的文類傳統，即便到了六朝抒情小賦興起，而江水、都邑這一類繼承漢大賦題材的題材，仍難免歌功頌德的題旨，國家權力隨時凝視著賦作者。<sup>18</sup> 而這樣的旨趣若深入發掘，就很自然地會與國家認同、軍事

<sup>13</sup> 如鄭毓瑜，《六朝情境美學》（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頁155-166；楊儒賓，〈山水是怎麼發現的——玄化山水析論〉，《臺大中文學報》第30期（2009年6月），頁209-254；蕭馳，《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11-76。

<sup>14</sup> 「（袁）山松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水經注校釋》，頁596。

<sup>15</sup> 「王子敬曰：『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言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45。

<sup>16</sup> 〔東漢〕班固，〈兩都賦序〉，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頁602-2。

<sup>17</sup> 〔南朝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校注，《文心雕龍校注》，頁50。「體國經野」出自《周禮·地官》，〔清〕阮元校勘，《周禮》，收入藝文印書館編，《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頁138-1。

<sup>18</sup> 此處「凝視」筆者參酌了傅柯的「全景敞視」，傅柯的論述是，監獄中犯人所受的最大監視在於看不到的監控者，這時權力就進入了全景，「權力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體現在肉體、表象、光線、目光聚焦的統一分配」，傅柯即稱此為「全景敞視主義」。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 1977), pp. 187, 195-197.

政治有關。

其次，過去的都城大賦以山川險阻側寫國家的壯盛，如「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呂太華終南之山」；<sup>19</sup>「嶠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sup>20</sup>等句，山川形勢與國家有所聯繫，而六朝除了江海題材的辭賦外，另外有幾篇以都城或宮殿為題的作品，也同時描敘了江海的意象。顯然，六朝都城建康與長江天險，造就了作者吟詠江海的外緣因素。後文也將提到，江南的許多事件都與水勢有關——如侯景（503-552）亂時建康遭圍，建康攻防賴於水勢；沈炯（503-561）等人的〈太極殿銘〉中順河而下的大柱，也成為國家象徵。

因此，本文談的並非作者個別的江海書寫，而是六朝文人的集體經驗。江海水勢除了作為南方文明的屏障；也扮演了都城的護城河、天險防線；更順流帶來祥瑞的徵兆。從神話學的角度，水代表重生的意象又與國家權力有所呼應與辯證。<sup>21</sup>按照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說法，國家的起源與神話有關，<sup>22</sup>加上水勢本身呈現的多重面貌，無論是壯闊翻騰或煙籠漫漶，在不同時代、不同歷史經驗的作者感受中，勢必將呈現複雜的意象。

從上述思考，六朝的江海書寫就不僅只有山水新感性這一面向，也不僅只是具神話原型的演變意義，六朝士人更以江海書寫——進一步去追認了他們這位於江南帝國的地理疆界。因此，本文分為幾個層次，首先探討江海辭賦與國家權力的關係；再則探討六朝賦作者如何

<sup>19</sup> 〔西漢〕班固，〈西都賦〉，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602-2。

<sup>20</sup> 〔西晉〕左思，〈蜀都賦〉，同前註，頁 1882-2。

<sup>21</sup> 前面提到田曉菲談南北朝的文化建構，就認為其中存在「陰性的南朝」架構；至於水與「重生」的論述，在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有相關探討，參見 p. 160；而水與大地的陰性與母性，可參酌〔德〕諾伊曼（Neumann Erich）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年）中的相關論述。

<sup>22</sup> 此處參酌〔德〕卡西勒著，范進等譯，《國家的神話》（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2 年），頁 359-362。

將江海元素帶入國家想像之中；最末略為探討六朝走向終局之際，水勢又扮演什麼樣的寓意？

## 二、江海作為想像的共同體——六朝的江海書寫

### （一）江海賦的演變與國家權力

隋代杜臺卿〈淮賦〉序中，先敘述「海賦」此一題材的寫作動機，再來對過去歷代海賦進行梳理。杜臺卿認為過去水賦對於江海的鋪陳，必須顧及「兼包化產」這幾種面向，「兼包」即寫江海的淵源、派勢；而「化產」則寫在江海中的各種魚群物種，以至於來自傳說想像的「水怪神物」：

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吟詠比賦，可得而言矣。詩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皆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彪有〈覽海賦〉，魏文帝有〈滄海賦〉，王粲有〈游海賦〉，晉成公綏有〈大海賦〉，潘岳有〈滄海賦〉，木玄虛、孫綽並有〈海賦〉……魏文帝雖有〈浮淮賦〉，止陳將卒赫怒，至于兼包化產，略無所載。<sup>23</sup>

「古人登高有作」顯然是從「登高而賦」這樣的概念來的，即便詠水賦海的題材能夠追溯到《詩·周南》，但照杜臺卿之見，「賦」顯然才是謳詠水勢最適合的體類。而他所臚列的這一系列水賦，如今或全或殘，大致都還得見。這一來顯示海賦對於作者以及時代具有的經典意義；二來由於海賦往往以大賦體制呈現，作者在章句藻飾與意象經營上都費了許多心力，也有利於成為類書蒐羅的對象。論及歷代「海賦」

<sup>23</sup> 〔隋〕杜臺卿，〈淮賦〉，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4133-2。「水怪神物」一語亦出於此賦。



的流變，首先應當注意到班彪（3-54）的〈覽海賦〉：

余有事于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  
馳鴻瀨以漂驚。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燿以成章。  
風波薄其裔裔，邈浩浩以湯湯。……松喬坐于東序，王母處于西箱。  
命韓眾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願結旅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  
聘飛龍之駮駕，歷八極而迴周。<sup>24</sup>

即便班彪此賦或屬殘篇，但他已經觸及了「海賦」的幾個核心素材，像對波濤水勢的壯麗描繪；或想像海洋另一端的仙境與仙人。而賦末駕飛龍、遊八極的仙鄉巡禮描繪，令人聯想到〈離騷〉或〈七發〉，如〈七發〉形容觀濤時的「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驛」。<sup>25</sup> 因壯闊的水勢而與仙境產生聯想，以至於神遊其中，足見滄海與仙鄉其間的連類之處。

由於江海的神秘與不可測，加上海底生物的富饒怪奇，作者對於江海所孕育化產的物種，充滿了想像力。像王粲（177-217）〈游海賦〉就敘述了這些某程度寫實，卻帶有誇飾和奇幻的生物：

懷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魚則橫尾曲頭，方目偃頤。大者若丘陵，小者重鈞石。乃有貴蛟大貝，明月夜光。蠃鼈瑇瑁，金質黑章。<sup>26</sup>

大賦向來重視這種鋪張揚厲的物類書寫，然而時至魏晉，賦家對於物類的經驗與寫實有了新的看法——就像左思（約 250-305）對於司馬

<sup>24</sup> 〔東漢〕班彪，〈覽海賦〉，同前註，頁 597-2。

<sup>25</sup> 〔西漢〕枚乘，〈七發〉，同前註，頁 239-1。

<sup>26</sup> 〔東漢〕王粲，〈游海賦〉，同前註，頁 958-1。

相如（約 179-117 B.C.）、揚雄（53 B.C.-18 A.D.）賦的批評。<sup>27</sup> 而相較於王粲描述這些實存於水底魚貝龜蛟，庾闡（?-?）〈海賦〉中的「鯨鯢蘊而乍見，虯螭涌而競遊」、「靈鼉朱鼈」、「騰龍掣水，巨鱗吞舟」，<sup>28</sup> 所敘述的更屬於非實際存在的物種了。

寫江海的波濤洶湧、地勢的兼包與物種的產化，這都是此題材辭賦固有的結構與範疇。然而江海與天險、軍事力量或國家聲威又是於何時產生連結呢？前面本文引用了杜臺卿的〈淮賦〉的序，他特別提到曹丕（187-226）的〈浮淮賦〉，說該賦內容「止陳將卒赫怒」，顯然杜臺卿對此書寫視角不甚滿意。然而賦江海進而觸及「將卒赫怒」等軍事意象，背後應當有更豐富的隱喻。除曹丕外，王粲也有〈浮淮賦〉，兩賦徵引於此：

浮飛舟之萬艘兮，建千將之鈇戈。……乃撞金鐘，爰伐雷鼓。白旄沖天，黃鉞扈扈。武將奮發，驍騎赫怒。于是驚風泛，涌波駭，眾帆張，羣櫂起。爭先遂進，莫適相待。<sup>29</sup>

從王師呂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于是迅風興，濤波動，長瀨潭澗，滂沛泓溶。鉦鼓若雷，旌麾翳日……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羣師按部，左右就隊。軸轡千里，名卒億計。<sup>30</sup>

<sup>27</sup> 〔西晉〕左思，〈三都賦序〉：「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呂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呂遊海若。假稱珍怪，呂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攷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見〔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882-1。考究左思的意思，他似乎並不認為不能寫神話傳說中物種，而是要考究其出處與適當性——這是辭賦向真實經驗過渡的主張。

<sup>28</sup> 〔東晉〕庾闡，〈海賦〉，同前註，頁 1678-1。

<sup>29</sup> 〔三國魏〕曹丕，〈浮淮賦〉，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072-2-1073-1。

<sup>30</sup> 〔東漢〕王粲，〈浮淮賦〉，同前註，頁 958-2。

曹丕的序述及此次東征渡淮，眼見舳艫千里而有感作賦，題旨本就在宣揚軍威，而將卒按部就隊，金鐘雷鼓的氣勢，已然超越了江水的波濤喧湧。於是江海的騰湧與國家、與軍事力量的聲威，在此有了對比與連結。江海的盛壯與國家的聲威、君權的延展，這在曹操（155-220）、曹丕〈滄海賦〉的殘篇中得以看出端倪。<sup>31</sup>

更從嚴謹的角度來說，王粲、曹丕所賦的江海並非江海的特質，而是從親臨江海的時空脈絡出發，將水勢與軍事力量或帝國和國家權力進行連結。也就是說，江海題材除了寫水脈之兼包、物種之化產以外，也能與時代背景、作者當下情緒與集體見聞有所關聯。由此來看，張融（444-497）〈海賦〉就呼應了兩晉以來的玄風，在序中張融說他「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sup>32</sup> 海洋的廣袤無垠、「東西無里，南北如天」等特殊情境氛圍，帶給作者很強烈的體驗，他以「壯」和「奇」描敘了海洋帶給他的刺激，<sup>33</sup> 而全篇以大賦體裁敘寫海洋的壯闊與奇偉。〈海賦〉最末一段明顯與道家思想有關：

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sup>34</sup>

《道德經》即以「水」喻「道」，而這篇賦的「不動動」或「不聲聲」，顯然正是「大音希聲；大象無形」<sup>35</sup> 的具體呈顯。「水」作為道的喻體，也表現了道的超越性。高莉芬曾指出，張融這篇〈海賦〉與道家的自然哲學、神話學有密切關聯：「老子以『水』喻『道』，正因『水』

<sup>31</sup> 〔三國魏〕曹操，〈滄海賦〉僅殘一句：「覽島嶼之所有」，看得出其間的權力俯瞰；而曹丕〈滄海賦〉僅存四句：「美百川之獨宗，壯滄海之威神。經扶桑而遐逝，跨天崖而託身」，同前註，頁 1072-2。

<sup>32</sup> 〔南朝齊〕張融，〈海賦〉，同前註，頁 2872-1。

<sup>33</sup> 〔南朝齊〕張融，〈海賦〉：「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同前註。

<sup>34</sup> 同前註，頁 2873-1。

<sup>35</sup> 陳鼓應注譯，《老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 229。

具有無限的創生力量，可以湧現內部能量，向外流現，衍成世界」，<sup>36</sup> 江海更具有「眾流所歸、永恆浩大的空間特質」。<sup>37</sup> 與王欣慧的觀點近似，高莉芬認為兩晉江海賦在對土地讚頌的同時，也展現了對政治的寄託、以及對聖王德政的追求。<sup>38</sup>

不過從筆者的角度來看：江海與國家恐怕有著更表層的連結——江海一方面是帝國的天然屏障，扮演穩固都城與國家局勢的關鍵；另一方面，在大規模涉江渡海過程中，舳艫千里、戰船羅列，軍事力量與水勢波濤複合成一種崇高而雄壯威武的體驗，此體驗很容易與國家的象徵與政權的想像產生聯繫。像庾闡、蕭綱兩篇〈海賦〉的開頭：「昔禹啟龍門，羣山既鑿。高明澄氣而清浮，厚載勢廣而盤礴」，<sup>39</sup> 聖王與國家、與江海有了緊密的聯想。而這樣的開頭顯然與木華（?-?）的〈海賦〉有著致敬的關係：

昔在帝媯，巨唐之代。天網淖滂，為凋為瘵。……禹也乃鎡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浹。啟龍門之岸嶺，垦陵巒而嶄鑿。羣山既略，百川潛滌。<sup>40</sup>

經歷了上古聖王治水鑿崖的事蹟後，河海派勢得以四通八達，無論「百川潛滌」（木華）或「灌注百川」（庾闡、蕭綱），最後才成就了「颺波于萬里之間，漂沫于扶桑之外」——<sup>41</sup> 吸納百川的無盡巨海。這樣交通匯流的敘事，讓人聯想到〈揚都賦〉「赴三峽之隘，洄九川之會。」

<sup>36</sup> 高莉芬，〈水的聖域：兩晉江海賦的原型與象徵〉，頁 136。

<sup>37</sup> 同前註，頁 137。

<sup>38</sup> 同前註，頁 139-140。

<sup>39</sup> 庾闡、蕭綱的兩篇〈海賦〉重複性很高，按照我們對於中古時期抄書、編類書的習慣，或許是其時文學集團編纂類書同時，將庾闡作品與之相混的結果。

<sup>40</sup> 〔西晉〕木華，〈海賦〉，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2062-1。

<sup>41</sup> 〔東晉〕庾闡，〈海賦〉，同前註，頁 1678-1。

<sup>42</sup> 大致上說來，歷代海賦即便有所變遷，也與儒家或道家有所摻雜、互涉，但多半仍提到水勢的兼包與化產，也多少都與國家的軍事、政治權力有所呼應。不過筆者另一個問題在於——晉室南渡、王朝偏安，長江成了江南帝國的最後一道防線。相對於海賦表現的「永恆浩大」，<sup>43</sup> 江水對六朝士人而言，顯然有另外一番感受。

## （二）「渡江」的寓意

當代學者對於國家民族與空間關聯的討論，有著頗為細膩的論述。包括同樣身處一空間的民族，如何透過專屬此土地的共同體經驗，來匯集民族意識；<sup>44</sup> 而跨越原本實存的地域界定，進而定義出一想像的或流動的地方，脫離原本固著的空間。<sup>45</sup> 如果說東晉之後，江南成為士人生命依存的空間，那麼他們一方面即便心懷北方失土，但卻又得在江南展開新生活，於是乎兩種情懷交織的空間經驗，就展現在他們的作品之中。

晉懷帝永嘉四年（310），永嘉之禍爆發、晉室南渡。江海不再只

---

<sup>42</sup> 〔東晉〕庾闡，〈揚都賦〉，同前註，頁 1678-2。

<sup>43</sup> 此為高莉芬所用語，〈水的聖域：兩晉江海賦的原型與象徵〉，頁 137。

<sup>44</sup> 如 Glenn Bowman 在探討巴勒斯坦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問題時認為：民族認同不見得會發展成民族運動，不同的地理位置是關鍵。而 Bowman 發現只有生活在同一塊土地的人，才能具有同一社群（community）成員的想像，見 Glenn Bowman, “Tales of the Lost Land: Palestinian Ident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ist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s”,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imited, 1993), pp. 73-100. 另外如〔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中亦提到國家建構與共同體經驗。

<sup>45</sup> 這是 Doreen Massey 對政治空間的看法，她認為「土地」可能不是一種固定的、固著（fixity）的概念，可能是居住其上流動、辯證的過程，參酌 Doreen Massey, *Place and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p. 137-152。

是文人偶爾遊觀的異質場所，而是代表故國的分界。尤其當時多數士人都經歷了國家改換、山河異代的越界經驗。《世說》有數則記載到渡江世族的情緒轉折，如「新亭對泣」這樣悲喜錯織，「欣於山水」<sup>46</sup>與「戮力神州」<sup>47</sup>這樣矛盾交混的情緒。其中衛玠（286-312）渡江一則，值得注意：

衛洗馬（玠）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sup>48</sup>

渡江後大勢底定，無論士人理智上對江南有所疑慮；<sup>49</sup>或精神上心懷故國神州，但隨著時間流逝，與故國的物理或心理距離只會更加遙遠。然而衛玠是在渡江之際即臨江慘悴，他的百感交集可能包括對江山異代的悲憤，對江南的陌生不安，對於國勢與身世難以理解。而這些難以釐清的複雜情緒，也就與江水湯湯茫茫，波濤洶湧的意象結合在一起，構成了這一代南渡士人前途未卜、無法理解卻又不得不然的生命際遇。

正因為身處這樣江山異代的整體愁緒與不安定感之中，所以有研究者認為「江海賦」取代了漢代的都邑大賦，而有頌美國家的象徵意義：「書寫江河、頌美江海，實具有現實的政治功能，以及重新確認集體凝聚力的『儀式』意義」。<sup>50</sup>當然，六朝時期仍然有如漢代的巨構京都大賦，不過篇幅長度與結構完整性也確不如漢代。郭璞（276-324）〈江賦〉「述川瀆之美」，<sup>51</sup>隱含對國家的想像與族群的凝

<sup>46</sup> 指袁山松「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事，見前註。

<sup>47</sup> 見〔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言語》，頁92。

<sup>48</sup> 同前註，頁94。

<sup>49</sup> 像「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同前註，頁97。

<sup>50</sup> 高莉芬，〈水的聖域：兩晉江海賦的原型與象徵〉，頁139-140。

<sup>51</sup> 〔唐〕李善（630-689）於郭璞〈江賦〉下注：「晉《中興書》曰：『璞以中興，三宅江外，

聚力。比〈江賦〉稍早，庾闡和曹毗（?-?）都有〈涉江賦〉，巧合的是兩位作者同時也都作〈揚都賦〉，<sup>52</sup> 前文談過都城與國家想像的關聯，這或許也是想像國家的過程中，「以江南空間中的人為景觀都城——建康，與自然景觀——江海重新定義國族存在的文化意義」。<sup>53</sup> 但更重要的是，都城建康倚賴長江天險而確立其安全穩固，而這樣的安全穩固又成為當時每個南渡士人所急需的象徵。於是賦詠天險長江與都城建康，就有了其必要性。

關於〈揚都賦〉我們容後再談，此處就兩篇〈涉江賦〉來說。曹毗〈涉江賦〉就篇幅來看或非全篇，而庾闡〈涉江賦〉則與他在〈揚都賦〉、〈海賦〉中的敘事、意象與架構都有些類似：

發中州之曲沔，背石頭之岩岨。溯晨風而遙邁，乘濤波而容與。於是時也，夕日將昏，天吳駭奔，陽侯漂海，若泛江豚。□□□爾乃雲霧勃起，風流溷淆。排岳拒瀨。觸石興濤。澎湃洗淖。鬱怒咆哮。迴連波以岳墜。壑后土而川宵。總百川之殊勢。集朝宗乎滄浪。注天波于析木。激東極乎扶桑。體含弘而彌泰。道謙尊而逾光。齊山海以比量。冠百谷而稱王。此則水之勢也。<sup>54</sup>

紫蓮被翠波而抗英，碧椹乘天岸而星懸。百籟夕奏，山精夜燃。狂飆蕭瑟以洞駭，洪濤突兀而橫峙。<sup>55</sup>

---

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見〔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557。

<sup>52</sup> 〔東晉〕曹毗，〈揚都賦〉，見〔唐〕房玄齡等，〈文苑傳〉，《晉書》（臺北：中華書局，1974年），卷92，頁2386，中稱其「亞於庾闡」，然其賦不存。

<sup>53</sup> 高莉芬，〈水的聖域：兩晉江海賦的原型與象徵〉，頁139。

<sup>54</sup> 〔東晉〕庾闡，〈涉江賦〉，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1678-1。

<sup>55</sup> 〔東晉〕曹毗，〈涉江賦〉，同前註，頁2075-1。

相較於研究者認為賦詠江海作為南渡國族的儀式意義；<sup>56</sup> 或認為江水營造出表現出「茫茫蕩蕩的氣氛」、<sup>57</sup>「展現開闊的、激昂的、充滿希望的氛圍」，<sup>58</sup> 筆者認為此處庾闡和曹毗這兩篇〈涉江賦〉，還書寫了江南的一種集體共同體的經驗。在這兩篇賦中，作者所營造不再是過去班彪那樣獨特的、對浩瀚海洋的未知想像與陌生感。庾闡賦有「於是時也，夕日將昏，天吳駭奔……雲霧勃起，風流溷滂」的敘述；曹毗也有「碧槎乘天岸而星懸」、「洪濤突兀而橫峙」的形容。以上這些描寫恐怕應是親臨長江、見識過長江景色與日夕變化的士人，所能擁有的共同經驗。換言之，過去漢大賦體國經野、四方鋪張的異域想像，已不再是〈涉江賦〉搬演的重點；而左思〈三都賦〉「稽之地圖」、「驗之方志」<sup>59</sup> 的宣示，也不同于庾闡、曹毗此處的書寫策略。

庾闡這篇賦前半部寫長江波濤驚挺，最末幾句才回歸他的涉江經驗：「過乎歷陽之津，迄乎橫江之浦。若乃越三江之下口，眇濡須以逕渡。」<sup>60</sup> 過歷陽、至橫江，橫越三江的過程寫來平實，沒有太多誇飾鋪張的敘述。相對來說郭璞〈江賦〉為大賦體裁，寫「川流之所歸湊」、也寫「珍怪之所化產」，<sup>61</sup> 關於長江的神話異錄或正史傳說，透過郭璞的讚頌，長江就如同兩漢辭賦謳歌的京殿苑獵似的，象徵國家權力。且若再細讀賦文就會發現，郭璞也同樣運用了所有格與共時性的策略，呈現長江之上，與「我們（存在於此江南時空的）每一個人」

<sup>56</sup> 高莉芬，〈水的聖域：兩晉江海賦的原型與象徵〉，頁 139-142。

<sup>57</sup> 王欣慧，《歷代京都賦的文化審視》（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年），頁 142。

<sup>58</sup> 同前註。

<sup>59</sup> 〔西晉〕左思，〈三都賦序〉：「余既思攀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882-1。

<sup>60</sup> 〔東晉〕庾闡，〈涉江賦〉，同前註，頁 1678-1。

<sup>61</sup> 〔東晉〕郭璞，〈江賦〉，收入〔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頁 571。



的密切關聯，如以下這段：

舟子于是搦棹，涉人于是櫂榜。漂飛雲、運餘艗，舳艫相屬，  
萬里連檣。泝迴沿流，或漁或商……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  
則羽褐，食惟蔬蠹。……或揮輪于懸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  
夕而宵歸，詠采菱呂叩舷。<sup>62</sup>

舟子涉人的行動、蘆人漁子的工作，當然也屬於辭賦鋪衍連類的套語，但郭璞必然數度臨江測繪，才得以如此深刻描摹。這些在江上活動與維生的「蘆人漁子」，與涉江南渡的士人，於是乎就成為了同一空間中的共同體，擁有了共同的經驗。而就此之後，長江再不同於神話想像或歷史遺跡的苑獵、宮殿，成為「我們」（即東晉以降一代的江南士人）生存與共的地景。江畔水域密集的人文活動、漁獵事業或商業行為，構成一幅宛如東晉版的清明上河圖。而作家透過對長江的摹寫，把江南想像成了一座共同體，想像成一座依江傍水而立的、有別於北方王朝的新國家。

### 三、天險的確立與終局——江海意象的演變

#### （一）江海與帝國意象

前面我們談〈浮淮賦〉，水勢波濤與軍容壯盛結合，成為國家權力的隱喻。而更明確提到江海與國家權力的即是庾闡的〈揚都賦〉。日本學者斯波義信指出：從先秦到漢代，城市由「邑制國家」過渡成為「郡縣制國家」，這於是造就了漢代「通都大邑」的誕生。<sup>63</sup> 而〈揚

<sup>62</sup> [東晉]郭璞，〈江賦〉，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2148-1。

<sup>63</sup> 相關論述筆者參酌〔日〕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4-16。

都賦》所寫的建康，同樣延續了大賦的視角，將建康與江南帝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在賦中的江海書寫，自然值得我們注意。

〈揚都賦〉完成當時、即得「可三兩京、四三都」<sup>64</sup> 的高度評價。不過謝安（320-385）批評其「事事擬學」<sup>65</sup> 也值得注意。鄭毓瑜就認為庾闡這篇大賦，可能不只在模擬兩漢京都賦，更隱含有權力中心重建與移轉，表現出都城與王權的「模糊游移關係」。<sup>66</sup> 如果從敘事視角與篇章結構來說，〈揚都賦〉與兩漢京都大賦非常相似。賦從揚都的地理形勢寫起，寫都城內部的宮殿館閣，也寫都城周遭的蟲魚鳥獸。辭賦中觸及有關都城建康如何堅穩的敘述，如以下這段：

子未聞揚都之巨偉也？左滄海，右岷山，龜鳥津其落，江漢演其源。碣金標乎象浦，注桐柏乎玄川。昔句吳端委，延州儷臧，高讓殆于庶幾，英風亞乎潁陽。土映黃旗之景，巒吐紫蓋之祥。巖栖赤松之館，岫啟縉雲之堂，龍符渙而夏德興。羣神萃而玉帛昌也。<sup>67</sup>

不可否認的是賦中很重視江水的奔流聲勢、以及沿江所設之關隘要塞。此外庾闡更進一步將過去有關金陵以及江南的祥瑞靈異傳說，皆引用作為揚都重要的城市象徵。如「黃旗之景」、「紫蓋之祥」，很明顯從「黃旗紫蓋」這樣代表江南「王氣」傳說化用，至於「赤松之館」、「縉雲之堂」也替這座江南都城增添了北方歷史名都所沒有的仙靈氣氛。

<sup>64</sup> 〔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頁 258。

<sup>65</sup> 同前註，就筆者的解釋：對於六朝文人來說，大賦即便有其代表性，卻已經失去新鮮感、淪為模擬疊床架屋，故當時即便有洛陽紙貴的推崇，也有謝安的負面批評。

<sup>66</sup>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38。

<sup>67</sup> 〔東晉〕庾闡，〈揚都賦〉，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678-2。

研究者認為這段表現出「江左受命乃是天意夏德的延續」、<sup>68</sup>「無非想藉由訴諸『共同起源』的集體記憶，喚起士人對江南地理空間／家國的認同」，<sup>69</sup>但筆者以為專屬於江南的氣氛更是庾闡的策略所在。江南以水鄉著名，建康三面臨水，因此，〈揚都賦〉較前代都邑賦，更多篇幅在描寫水勢樣態：

于是乎源澤浩蕩，林阜隱蒼。彭蠡吞江，荊牙吐瀨。赴三峽之隘，洞九川之會。判五嶺而分流，鼓沱潛而碎沛。逢渤澥滄，潢漾擁涌，驚波霆激，駭浪川動。東注尾閭，呼噏洞庭。茫若雲漢，窈若青城。……魚則鮫鱸鱣鮪，比目鱠魴……其中則靈蛟、白鼈之族，種繁六眸，類豐三足。鸚螺蛻骨，寄居負殼。<sup>70</sup>

「赴三峽之隘，洞九川之會」主要寫建康匯流的水脈，而「逢渤澥滄」、「驚波霆激」則形容水勢翻騰的驚險。而這樣的描敘不僅在表現水勢給予作者的衝擊與感受而已，庾闡在其〈海賦〉也寫過「長風鼓怒，涌浪碎礧」、「驚浪嶢峩，眇漫滌汨」<sup>71</sup>這一類對海浪波濤的形容，而他顯然也將對於江海的描摹挪用來寫都城——水勢的交流匯通，代表了城市的便捷；水勢的壯盛洶湧，代表了國家的穩固，此兩者都相互呼應，奠定了江南王朝的政治、軍事與國家權力的核心。再加上賦中描繪或實際或想像的水底生物，<sup>72</sup>從北方的山勢險峻到江南的水勢洶湧，從實際存在的物種到想像或文獻中的物類——〈揚都賦〉建構了一與北方與前代都城賦全然不同的敘述策略，而此策略又與江海和其背後的國家想像密切連結。

<sup>68</sup> 王欣慧，《歷代京都賦的文化審視》，頁 145。

<sup>69</sup> 同前註。

<sup>70</sup> 〔東晉〕庾闡，〈揚都賦〉，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1678-2。

<sup>71</sup> 〔東晉〕庾闡，〈海賦〉，同前註，頁 1678-1。

<sup>72</sup> 「魚則鮫鱸鱣鮪，比目鱠魴。脩鯤橫海，徵鯨偃波，□□□□，鰐鱗霜牙。其中則靈蛟、白鼈之族，種繁六眸，類豐三足。鸚螺蛻骨，寄居負殼」，同前註。

除此之外，〈揚都賦〉下有三條注疏，或為庾闡自注也可能為後人所注，但無論何者，此三條注疏頗值得重視。其中「蔣山」條下注曰：「建康宮北十里有蔣山，輿地圖謂之鍾山……望氣者云：蔣山上有紫雲」。<sup>73</sup> 關於金陵王氣的記載，僅約略提到「東南」廣泛的空間指涉，然而在此條注中，卻明確地將「紫蓋」這個意象與「紫雲」此天象作了聯繫，又將鍾山這個特殊地景標舉出來，呼應了龍蟠虎踞的金陵傳說。至於「烽火」下注「呂炬置于孤山頭，皆緣江相望。……孫權時，合暮舉烽于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sup>74</sup> 沿江畔所設置的烽火，用來傳遞軍情，烽火與長江結合成為一防禦設施的整體，成為穩定江南王朝的權力與國家基礎的疆界。而這樣的疆界大抵來說，就是以長江天險為主體，依附於滄渤翻湧的奔流水勢。若水奔不止，則國家霸業也自當要綿延不絕。

總括來說，庾闡這篇賦或許模擬軌跡甚深，盡踵漢代京都賦規模，但從本文主軸來看，〈揚都賦〉將都城建康與洶湧水勢結合，建構出了一種屬於六朝都城的新敘事策略。在此基礎上，得以深入挖掘六朝辭賦的江海書寫與都城、國家之關聯。不過若從歷史現實來看〈揚都賦〉，賦透過江水隱喻國家的長治久安、萬世基業，終究只是出於想像，有著浪漫與歌頌的詩意。我們不能肯定庾闡是不是真的相信這偏安江南的王朝能國祚綿延，但他仍然複製了兩漢京都賦的穩固敘述，庾闡後的辭賦作者提到金陵時，也會側重於水勢描繪，如陶弘景（456-536）的〈水仙賦〉，賦的對象是投水而尸解的「水仙」，<sup>75</sup> 但

<sup>73</sup> 同前註，頁 1679-1。

<sup>74</sup> 同前註。

<sup>75</sup> 「水仙」屬於道教系統中的「尸解仙」之一種，根據〔北宋〕李昉等編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頁 3093-1，引《登真隱訣》：「尸解者，當死之時，或刀兵水火痛楚之切，不異世人也。既死之後，其神方得遷逝，形不能去爾」。其中投水而死者則化為水仙。據《道藏》稱：尸解之後「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但不死而已」。

賦中卻特別提到了建康，談建康所處的地理格局，以及建康周遭水勢壯闊的景象：

塗山石帳，天后翠幙，夏禹所呂集羣臣也。岷嶠交錯，上貫井絡。窮漢硯礮，橫帶玉繩。浸湯泉於桂渚，涌沸壑於金陵。崩沙轉石，驚湍走沫。絕壁飛流，萬丈懸瀨。奔激芒碭之間，馳騫壺口之外。逮乎璇網運極，九六數翻。<sup>76</sup>

賦中水仙所在，恰為觀覽江水的波濤奔流之景，而「金陵」在此脈絡特別被標記出來，成為關鍵的地景。從文脈來看——「崩沙轉石，驚湍走沫」、「奔激芒碭之間」或「馳騫壺口之外」，這都能使人聯想到江海賦中波濤騰湧，或〈揚都賦〉中江流匯聚的場面。於是，都城就成了目擊「湯泉」、「涌沸」或「崩沙轉石」的觀測點，水勢騰湧的景象也與國家權力有了連結。

而另一個例證是張纘（499-549）的〈南征賦〉，張纘曾任蕭統（501-531）的太子舍人，與裴子野（469-530）「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sup>77</sup> 其後「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sup>78</sup> 遷為湘州刺史。〈南征賦〉即作於他往湘州途中。<sup>79</sup> 賦中張纘敘述了他逆流而上所見的長江流域景色，全賦不同於過去征戍賦的黃沙風塵，而以長江水域派勢為主軸：

故黃旗紫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壁，爰獻璽于武王。啟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沂金牛之迅渚，覩靈山之雄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標素嶺

<sup>76</sup> 〔南朝梁〕陶弘景，〈水仙賦〉，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213。

<sup>77</sup> 〔唐〕姚思廉，〈張纘列傳〉，《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34，頁493。

<sup>78</sup> 同前註。

<sup>79</sup> 同前註，頁494。

乎青壁，葺頽文于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浪。鏟千尋之峭岸，萬澗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卻。<sup>80</sup>

張纘以大賦體裁，從都城的祥瑞徵兆和君主的中興開始敘述，其中精彩而關鍵的段落，仍然是他於順流而下所眼見的「驚湍駭浪」、「萬澗大壑」等畫面。此處「江南丘墟」的江南實指江州、湘州一帶，然而張纘以漢代〈北征〉這類的大賦主題，書寫了一套屬於長江流域、屬於南方的征戍經驗。或許我們可以說，書寫南方的都城形勢或南方的征戍經驗，作者可能運用一套與北方及前代不同的詞彙、意象與架構。其間江水的流域風光、舟船的移動經驗、波濤的驚挺險阻，都構成了南方王朝獨特的國家想像與文化屬性。<sup>81</sup> 然而隨著江南王朝的覆滅，這樣的江海書寫又呈現什麼樣的轉變？

## （二）天險的入侵與結局

太清二年（548）侯景亂起，同年十二月叛軍兵臨建康城下，建康城在圍城百日後終被攻陷。從後見之明來說，建康城陷某種程度也隱喻了國家傾覆的最終結局。但水勢天險在戰亂與毀滅前夕，也扮演重要意義。太清二年十月，侯景軍攻至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開城降敵，且對於侯景軍接下來的攻勢提出建言：

（鐵）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

<sup>80</sup> [南朝梁]張纘，〈南征賦〉，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330-2—3331-1。

<sup>81</sup> 關於「文化屬性」這個概念，筆者參酌劉苑如所提到的，一個空間可能會複合的不同空間記憶與文化屬性。參酌劉苑如，〈廬山慧遠的兩個面向——從〈廬山略記〉與〈遊石門詩序〉談起〉，《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頁78。

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上（蕭衍）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sup>82</sup>

要成大功則得攻陷建康，而攻陷建康最大的關卡仍然是「渡江」。於是侯景和蕭衍（464-549）皆視采石為最後決戰的關鍵，無奈在朱异（483-549）誤導下，羊侃（496-549）建議未能遂行。江水天險在最後失去了其作為帝國屏障的意義。但莊鐵所說的「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仍顯示出長江天險對於建康而言是何等重要、又扮演了何等關鍵而逆轉戰局的可能。

侯景之亂對於建康造成大規模而全面性的破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建康並非開城投降，而是漸進的、局部潰敗的過程。聞侯景渡江建康城進入戒嚴，城民也陷入混亂。<sup>83</sup>十二月，侯景軍準備攻入臺城內部，兵臨秦淮河，這對臺城宮室而言，已是退無可退的最後一道防線。而此臨河拒敵的任務，蕭綱將之交給了關係親密的庾信（513-581）。此事在《周書》裡記述較為片段：「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眾先退」，<sup>84</sup>然而在《資治通鑑》中詳細述及這次對陣的始末與細節：

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營桁北。太子命信開

<sup>82</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4983。

<sup>83</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景）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頁4984-4985。

<sup>84</sup> [唐]令狐德棻，〈庾信列傳〉，《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卷41，頁747。

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帥眾開桁，始除一船，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遊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渡景。<sup>85</sup>

庾信本來有機會切斷朱雀桁其上的浮橋，然而「始除一船」就見到著鐵面的侯景軍隊，「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這樣狼狽倉皇而逃的敘述，不僅是庾信個人的恥辱，更是爾後臺城陷落的關鍵原因。田曉菲認為在此一役，庾信親身參與了江南陷落，因此他「終其一生似乎都被負疚感、悔恨、羞恥和思鄉情緒所折磨」，<sup>86</sup>「在庾信晚年最後寫下的詩篇裡，他預見了南朝的覆滅，沒有自我欺騙，也沒有任何自我安慰」。<sup>87</sup>

在庾信倉皇潰逃之後，很快地蕭正德（?-549）的黨羽「復閉桁渡景」、重新接起了被庾信切斷的橋船，於是建康最後一道以水勢作為的屏障，在此也失去了效用。其後水勢對於江南帝國而言，就再也不具有安全、穩固與防禦的功能了。在兩軍對峙、坐困圍城的這段時間，建康經歷了火燒水淹：「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sup>88</sup>「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並為洪波矣」，<sup>89</sup>鄭毓瑜對此有一個感性的形容：「在外的戰亂、死寂、啼號，以及為洪波掩灌的御闕、為戰火焚燒的火城——建康」，<sup>90</sup>而筆

<sup>85</sup>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頁4983。

<sup>86</sup>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頁279。

<sup>87</sup> 同前註。

<sup>88</sup> [唐]姚思廉，《侯景列傳》，《梁書》，卷56，頁844。

<sup>89</sup> 同前註。

<sup>90</sup>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頁113。



者認為，隨著建康的城陷，「江水」所代表的意象也隨之改變了。<sup>91</sup>

即便侯景之亂平定，但六朝國勢也走向終局。代梁而興的陳版圖僅限縮於長江下游，在修復建康城時期徐陵（507-583）、沈炯曾作〈太極殿銘〉，此文雖非賦體，卻頗具對照六朝江海賦的意義。<sup>92</sup> 兩篇銘的序及內文摘引如下：

夫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體貞固。天居爽塏，大寢尊嚴。高應端門，……即日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在後渚岸。嵯峨容與，若漢水之僂槎。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刹。……東虜窺江，西胡犯蹕。定之方中，亟興師旅。揆之呂日，輒有災故。是知秦人所止，實漢祖而為宮。吳都佳氣，乃元皇而斯宅。<sup>93</sup>

至陳永定，六合既清。五禮稍備，雕楹玉鳥。華棖壁璫，揆之有日。而猶一柱榱桷，豫章地淪外寇。楚材晉用，非復我求。既而新亭前江，有流查甚壯。盤根錯節，枝葉葱蒨。津人呂聞，正堪時用。于是將作受詔，冬官奉職。<sup>94</sup>

其中「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這樣的事件描敘，值得我們注意。在太極殿重建時期，這一枚順江漂流而下的樟木，被徐陵形容成「漢水

<sup>91</sup> 或許從前文〈太極殿銘〉看起來，建康重建時期，文人仍提到建康的王氣與長江的水勢，不過建康經歷這樣的災禍，水勢帶來的祥瑞，多少有些附會與逞強的意味了。

<sup>92</sup> 筆者此處倒不是認為「銘」屬於賦體雜文，從文類界分的角度，銘誄自為一類，但從題材來說，如「京都」、「宮殿」與「苑囿」向來是辭賦的重要題材，它們與帝國權力、國家想像密切相關。若將「京殿苑獵」此類題材，視為漢代辭賦對於軍事、國家權力的具體展現，「太極殿」這個主題，也很適合賦體來發揮。不過本文論述談江海書寫，文體以辭賦為準卻不侷限辭賦，於此說明。

<sup>93</sup> 〔南朝陳〕徐陵，〈太極殿銘〉，收入〔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3457-2—3458-1。

<sup>94</sup> 〔南朝陳〕沈炯，〈太極殿銘〉，同前註，3481-2。

之僂槎」、「新亭之龍剝」，被沈炯形容為「楚材晉用，非復我求」，江南王朝依長江水勢而建立都城，肇建宮殿，然而宮殿裡的某間某柱，仍須仰賴江水漂流而到來。金陵「紫蓋黃旗」、「虎踞龍蟠」的傳說，似乎也隨著此木漂流而下恆久延續著，且隨江水的蔓衍流長，南方王朝再度建構出新的神話傳說。

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江南的國家疆域與權力與水勢密切相關，長江天險成了最穩固而不會撤守的防線，然而當防線被侵入攻破之時，也就成了都城毀滅、國家傾覆之時。在爾後詠史懷古的詩歌中，六朝與江海水勢是經常出現的意象，著名如劉禹錫（772-842）「千尋鐵鎖沉江底」，<sup>95</sup>「淮水東邊舊時月」；<sup>96</sup>杜牧（803-852）的「夜泊秦淮近酒家」；<sup>97</sup>或韋莊（836-910）的「無情最是臺城柳」，<sup>98</sup>但無論千尋鐵鎖或臺城碧柳，它們只能是無情的見證者，如過去學者論詠史懷古詩歌時所說的：「（自然物色）只是無情無知的自然物而已，人們附加於它的所有象徵，最後都將剝落，被愚弄的還是人類自己。」<sup>99</sup>這種水勢意象的轉變，很可能即是來自本文所談的都城毀滅、國家傾覆之六朝終局。即便水勢已不再是國家天險，但仍成為見證這一切變遷消長的自然物，成為喚起記憶的殘餘。<sup>100</sup>

<sup>95</sup> [唐]劉禹錫，〈西塞山懷古〉，[唐]劉禹錫著，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24，頁300。

<sup>96</sup> [唐]劉禹錫，〈石頭城〉，同前註，頁310。

<sup>97</sup> [唐]杜牧，〈泊秦淮〉，[唐]杜牧著，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4，頁517。

<sup>98</sup> [唐]韋莊，〈臺城〉，[唐]韋莊著，聶安福箋注，《韋莊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71。

<sup>99</sup> 張火慶，〈中國文學中的歷史世界〉，收入蔡英俊主編，《抒情的境界》（臺北：聯經出版，1982年），頁292。

<sup>100</sup> 關於記憶殘餘的說法，參酌[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一書中的觀點，頁6-10。

## 四、結語：江海與國家想像

如同本文開頭所徵引的鄭板橋之絕句〈南朝〉，六朝士人對於江水有著真實的經驗與獨特的情感，然而天險再怎麼悠長穩固，終究難以確保南方帝國的長治久安。其實不只南人愛說長江水，六朝與水勢成為一個複合的意象，經常出現於爾後的文學作品中。綜合以上所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點作為結語：

### （一）辭賦與國家象徵的關聯

對於漢代重要都邑如長安、洛陽而言，作者多以山勢險峻、陸路交通作為鋪陳的對象。然而到了六朝，江水與據點、關隘等軍事力量有了更密切的關聯，我們看到《水經注》的許多江畔地景，都與軍事、國家與政治大歷史有關。六朝山水詩確實乃此時代獨特的體類，然而山水詩的新感性終究是一個特例。我們在辭賦中發現作者所描寫的江海水勢，仍是它舊有的脈絡與意象，如何謳詠其驚濤險急，如何將之與都城、國家的穩固連結在一起——如〈揚都賦〉「赴三峽之隘，洞九川之會。判五嶺而分流，鼓沱潛而碎沛」、「驚波靈激，駭浪川動」這樣的形容，這也是本文以辭賦為主要考察文體的原因。

### （二）六朝江海賦的獨特意義

歷代「海賦」大抵都具備描寫水勢派流的「兼包」，以及蟲魚物種的「化產」，然就今日尚存的作品來看，建安時的幾篇江海賦，將江海的波濤壯闊與軍隊的威武聲勢結合，以水勢壯闊襯托軍容盛壯。到了清談玄學盛行東晉南朝，郭璞、張融的江海賦又與道家思維有所牽涉。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渡江賦〉這樣的題材，北方士人在喪亂憂

國的情緒之下，渡過了茫茫江水，對國家前程在理智上與精神上都有所疑慮與悲傷，高莉芬即認為在這種不安全感之下，賦寫江海實則具有政治儀式的意味。不過本文從國家共同體的視角，發現此時期的〈江賦〉、〈涉江賦〉，特別強調江南的共時性經驗，將南方想像成擁有一共同經驗的場域。因此，透過賦詠江水，南方的新王朝也就有了與北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屬性——這也是六朝江海賦所隱含獨特的政治寓言。

### （三）都城毀滅前後的江海意象

誠如前文所述，在建康毀滅、六朝傾覆之前，水勢作為天險，作為確保南方王朝基業的穩固防線，受到創作者的謳歌賦詠，尤其是水勢的驚急與騰湧，又與都城建康有著密切的關係——像庾闡的〈揚都賦〉、張纘的〈南征賦〉，江海派勢與南方建國的大歷史有所連結。然而水勢既是江南的最後一道防線、也就意謂著當敵兵越江渡水同時，都城與國家也只剩毀滅一途。隨著侯景之亂、北朝統一，水勢天險一再遭到攻陷，江南的帝國也注定流向一去不返的終局。侯景亂後陳朝代梁而興，然長江中游已入北朝統治。陳朝成了偏安中的偏安格局。即便徐陵、沈炯的〈太極殿銘〉仍歌詠順水而流的漂流木之祥瑞與神聖特質，終究無法改變六朝終將走向衰亡的終局。

南朝千古傷心事，在六朝之後，都城建康、長江天險、龍蟠虎踞，從文人實際生活的時空場所，一變成為古蹟、成為文學意象。詠史懷古的詩歌常以金陵、長江或秦淮河為主題，但江水要不就是無情地見證歷史的興衰，文明的徒勞；要不就是隨著作者的移情而投射了悼念與感傷。無論何者，洶湧激越的江海，已經再也無法成為堅固安全的歌頌對象，而只能是見證歷史的無情客體，繼續浩浩湯湯、奔流不絕。

（責任校對：江曉輝）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西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 〔南朝宋〕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南朝梁〕劉勰著，〔清〕黃叔琳校注，《文心雕龍校注》，臺北：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2年。
-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南朝梁〕蕭統著，〔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唐〕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
- 〔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唐〕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唐〕劉禹錫著，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唐〕杜牧著，吳在慶校注，《杜牧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唐〕韋莊著，聶安福箋注，《韋莊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北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 〔北宋〕周應和，《景定建康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明〕張宇初等編，《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

〔清〕鄭板橋，《鄭板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

〔清〕阮元校勘，《周禮》，收入藝文印書館編，《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清〕遂欽立輯，《先秦漢魏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二、近人著作

王文進，《南朝邊塞詩新論》，臺北：里仁書局，2000年。

王欣慧，《歷代京都賦的文化審視》，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朱楔，《金陵古跡圖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吳翊良，《空間·神話·行旅——漢晉辭賦中的「山水書寫」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

高莉芬，〈水的聖域：兩晉江海賦的原型與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1期，2004年6月，頁113-148。

陳鼓應注譯，《老子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程章燦，〈金陵王氣（上）〉，《古典文學知識》第1期，2002年，頁34-35。

\_\_\_\_\_，〈金陵王氣（下）〉，《古典文學知識》第2期，2002年，頁99-103。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文化史》，臺北：雲龍出版社，2002年。

蔡英俊主編，《抒情的境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

- 劉苑如，〈廬山慧遠的兩個面向——從〈廬山略記〉與〈遊石門詩序〉談起〉，《漢學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頁71-106。
- 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
-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廖蔚卿，《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7年。
- 盧海鳴，《六朝都城》，南京：南京出版社，2002年。
- 蕭馳，《佛法與詩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日〕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 〔美〕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著，謝佩姮譯，《城市的歷史》，臺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
- 〔德〕艾瑞旭·諾伊曼（Erich Neumann）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
- Doreen Massey. *Place and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 Glenn Bowman. *Space and Place: Theories of Identity and Locati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Limited, 1993.
-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 1977.
-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 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清華學報

Press, 1998.

XiaoFei Tian.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he Long Natural Barrier: A Study of  
“*Jianghai* (River and Ocean) Writing”  
江海書寫 and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Six Dynasties *Fu* 賦**

Li-Feng Chi\*

**Abstract**

In contrast to earlier dynasties, whose capitals were shielded by mountains, the founding of the Six Dynasties relied on the Yangtze River 長江, and the capital had a close connection to its water flows. Based on this geographical distinction, I discuss “*jianghai* (river and ocean) writing” 江海書寫 in Six Dynasties *fu* 賦 and look in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flows and the capital.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 In part one, I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nghai* writing and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In part two, I investigate how *jianghai* compositions of the period discussed the stability of the capital, and observe how writers used spectacular water flows to symbolize the reputation of the state. It i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in later writings,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period when the Southern states began to decline, the water flows took on images of cruelty and sadness. Through this analysis, I hope to clarify the import of *jianghai* imag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Six Dynasties, *jiangfu* 江賦, *haifu* 海賦, national power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